

上海人

韩

正

叶静宇



让社会活跃起来

转型的路充满风险与挑战。如何深化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认识，克服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的阻力，甚至如何协调与中央的行动，都是微妙而复杂的课题。

作为老工业基地，上海的国有企业特别强，经营性国有资产比例也很高。韩正在谈及国企改革时曾表示，改革的方向，一定是开放性、市场化的重组。除了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和政府必须要承担的基础设施外，都要加快推进市场化。

对于上海而言，如果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私营企业的总量又不够，经济活力也就迸发不出来。但国企改革往往在体制、人事、市场化上都存在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海的国企改革尽管推进了多年，依然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尽管在外界看来，上海是中国最有希望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但是，在过去10年间，如何保持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却是上海市政府最忧心的问题之一。

上海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皓耀认为，上海的创新环境并不理想，高成本和体制的制约，使一些新兴产业和企业几乎得不到“试错”的余地，上海的人才引进后继乏力。在过去几年间，包括俞正声和韩正在内的上海党政领导班子已经意识到，居住、教育和医疗保障等问题，正在逐渐使上海的人才优势消失。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必将对法治环境、政府廉能、舆论公开、民主决策、人才吸纳、企业创新、多元文化、社会宽容等都提出更高的要求，原有的社会管理方式越来越桎梏着上海的社会活力。

韩正亦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说，上海经济转型的枢纽在于政府转型。因为相对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高端服务业，其核心是人的创造性的智慧劳动，这使得

她是睿智亲和的主持人，也是闪光灯前的时尚达人；她一手卖电视节目，一手做电子商务，实现了从充满文艺气质的主持人到CEO的完美转型。如今，由她带领的东方风行传媒每年制作电视节目500多个小时，发行到全国近200家电视台，收视人群在6亿人次以上，而她创办的“乐蜂网”更是在两年内盈利1个亿。

“再叫我女强人，我跟你急啊。”李静在接受采访时，乐呵呵地自封“二姐”：“我生活中特别爱结交一些性格简单又很容易满足的人，我们自称‘二姐俱乐部成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怎么又高兴了？”

误打误撞当上主持

毕业于河北师大音乐系手风琴专业的李静，是“被迫”拿起话筒的。“我当时在张家口电视台做音乐编辑，后来因为形象比较好，被领导硬安排做了主持人。做了一年没找到感觉，就到电影学院进修弹琴了，刚好又碰到北京电视台去电影学院挑人，就彻底跨进了主持的门。”

两年后，李静进了中央电视台，主持《欢聚一堂》、《周末大回旋》、《精彩十分》节目，一待就是5年。尽管在央视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李静却感到自己的运气开始下滑：“当时编导都挺器重我的，只是没有那么多好的节目让我上。我没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每天像混吃混喝。难道一直这样过吗？”深思熟虑后，李静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向央视辞职，自己做节目。

2000年，李静和戴军召集了几个铁了心要做电视的年轻人，租了间平房，成立了东方风行传媒文化有限公司。“我和戴军不是合作伙伴，是搭档、朋友以及亲人。有些事，说给朋友听，会看到人家眼中锋利的嘲笑，但戴军不会，他了解我的矛盾、软弱和小女人的心事。这些年的路，是我们一起走过的。”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和其他主持人最大的不同是，我自己给自己做馅饼，从组建团队到起名和营销都是我自已完成的。我很幸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李静感怀地说。

朋友叫我“李铁梅、李进喜”

在李静眼中，如果有一个节目能做到老，那就应该是访问节目。“我可能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人。在上台前我会尽量避免跟嘉宾接触，这样才

它对制度、文化、法治环境等的要求更甚于对基础设施、税收优惠的要求。

韩正看来，上海的社会活力还不够，而社会活力正是要依靠改革。政府要尽可能使用公共财政去购买公共服务。如果大量的社会组织发育起来，去从事社会活动，完成社会职能，社会就活跃起来了。

(摘自2012年11月23日《经济观察报》)

莫言喜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一片兴高采烈中，我注意到一个比较“另类”的声音，那是身体不适、已停止写作的大同作家曹乃谦发出的：“中国这么大，有这么优秀的作家，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人再获此殊荣，莫言获奖空前，但是不会绝后。”

曹乃谦曾是该奖项的热门人选，此刻他发此言，决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是肺腑之言。

他个性极强，思维好像向来就是逆向的，从不人云亦云。有人说“写小说一定要在故事情节上下工夫”，他却说“这样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小商贩而已。精彩的细节才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有人说“作品是改出来的”，他反驳说“我不太主张硬着头皮修改自己的作品。生出的孩子是俊是丑是中等，这已是固定下来的事了。与其擦脂抹粉地改，还不如写篇新的”。有人说写作要有总纲、突出主题，他说：“我写东西时从来没想过‘主题’呀、‘立意’呀、‘中心思想’呀这类的事情，想写什么了、什么事的时候，蒙住头写就行了，根本不想别的。”有人崇拜高产作家，他反其道而行之，

“别人写小说就像做绢人，做了一个又一个。我写小说就像是生孩子，慢，一辈子能生几个呢？这得有点精品意识，石头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颗。龙生一仔打天下，猪产一窝拱墙根。”

事实也确实如此，他目前发表的文学作品虽然只有区区100余万字，却有30多篇被翻译介绍到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瑞典等国。1988年，曹乃谦在《北京文学》发表《温家窑风景》系列短篇小说，汪曾祺先生欣然提笔写了3000字篇幅热情洋溢的评论，说曹乃谦的作品有对原始生存状态的生活和这里人们食和性上的饥渴的严重关切，是经过痛苦的思索的，用的是雁北人的乡土语言和叙述方式，有地地道道的“莜面味”，这种生活是荒谬的，无可奈何的，但又是真实的。

他的“莜面味”小说意外地引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的关注。马悦然曾说，曹乃谦的作品很有味道，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和非常有希望的作家。北京、上海、广东的那些专门搞文学的人，应该读读他的东西。

曹乃谦的逆向思维

李生明

能保持新鲜感，让彼此有话说。”

现在，李静不仅主持《超级访问》、《非常静距离》等几档人气颇高的节目，更身兼制片人、公司CEO等角色，还有了自己的电子商务网站乐蜂网，还自创了化妆品牌。“我是一个精力特别充沛的人，知道我的朋友都叫我李铁梅、李进喜。我可以一边开会一边接电话一边打电话。在家也是，跟黄小茂（丈夫）说话的时候，手底下从来都不会闲着。我还有个外号叫‘李八姐’（一天之内奔波操持8个节目组），经常在车里换了衣服就去参加下一个活动。去美容院美容，我每次都是时间不到就起来走人了。我有些偏执狂的个性，做起事情来很卖命，而且是亲力亲为。乐蜂网招聘高管的时候，有应聘者是香港的没办法来，我买了一张机票专门飞到香港，在机场的咖啡厅面试，从早晨一直面试到下午，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贩毒的呢！”

李静说：“我老公说我对很多事情智商特别高，但是对于喜欢的事情我确实会有‘惊人的创造力’和毅力。”

做访谈是用人品说话

现在访谈类节目收视率普遍偏低，但《非常静距离》在全国各大视频网站上的点击率却一直排在前五名。“我看了看前四，投入都是我们的几倍，不是大型综艺就是大型选秀。我觉得访谈节目的根本就在于主持人，除了访问技巧，更重要的是你的行业地位和职业年龄。美国一些大牌主持人都做了将近20年。从《超级访问》到现在，我也算是访谈类节目里资历最久的主持人之一了。我接触的一些明星，很多是从他们刚出道一直走到现在，彼此之间都很真实。所以做到现在，就是在用人品说话了。”

私底下，李静与很多嘉宾的关系非常好。“有一次我做慈善晚宴，那英就说，‘得了，我把你演唱会的晚礼服拿来’。大家都有起起伏伏的时候，我不是那种只跟很红的明星在一起的那种人。生活中发生很多事，我由衷地去帮助别人。这种交情积累起来，我做节目也就有很多嘉宾捧场了。”

对于采访对象的选择，李静有自己的标准：“我内心一直希望在节目中展示美好的东西。就一个理由，特别简单，就是你希望你的孩子未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当中，你该做些什么样的节目。”

(摘自2012年7月15日《新民晚报》)

黄裳 锦帆影远燕树空

李乃清

“每读高文，隽永如硕果苦茗，而穿穴载籍，俯首即是，着手成春。东坡称退之所谓云锦裳也，黄裳云乎哉。”1981年3月15日，钱锺书致函黄裳，由衷赞其散文之美。

品《关于美国兵》，“有点像水浒英雄上山前必须缴纳的‘投名状’，它为我成为一名记者起了同样的作用。”

从记者到散文大家

1945年下半年，黄裳成为上海《文汇报》的驻渝记者。此时的他尚未换装，揣着一匣印着特派员头衔的名片，身披G.I.“老虎皮”（美军制服）闯入连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都进不了的整军方案签字会场，完成了独家报道。

1946年夏，黄裳回沪，后一直供职于《文汇报》。他“访问过狱中的周作人，也访问过住在宫殿式的中央研究院里的傅斯年”，还和巴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巴金推荐下，黄裳出版了第一本散文著作《锦帆集》。紧接着，其专栏文字《旧戏新谈》也陆续出版，得到历史学家吴晗的高度肯定。

1947年前后，黄裳与年龄相差无几的黄永玉、汪曾祺往来甚密。在黄永玉眼中，当年还任中兴轮船高级职员员的黄裳“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个，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就昂然而出，和我们走了”。3人漫步霞飞路，评说天下，臧否人物。“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的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黄永玉《黄裳浅识》）

解放初，黄裳因《杂文复兴》这则短文“闯了祸”，被打成“右派”，此后近20年报上再不见他的文章，直到《读书》杂志面世才见其复出。

当时，黄裳的一系列文章给人惊才绝艳的感觉，连一批文章高手都争相阅读。作家舒芜曾有回忆：

“文革”中，黄裳的藏书曾被洗劫一空，这无疑是一沉痛一击，但他却说：“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这段话令多少爱书人喟叹，傅月庵就曾在《爱黄裳》一文中表示敬仰：“苦难让有些人变得矮小，有些人变得高大，黄裳先生无疑是后者。”

宽厚可爱的人

黄裳是《读书》仅有的从创刊一直写到生命终止前不久的33年的老作者。去年，他还以九二高龄与老友黄永玉双双在《收获》上开辟专栏，一个徜徉“来燕树”（《来燕树书跋》），一个闯荡“无愁河”（《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同时还愿意从容、健笔豪纵地应对着各方笔仗，幽默老将，气韵雍和。

令人扼腕的是，今年9月，容老（黄裳原名容鼎昌）已随黄鹤去，此地空余来燕树（黄裳书斋名）。

曾有沪上出版人回忆，昔日拜访王元化讨论“文章谁写得好”，王老断然下判：“文章写得好的当然是黄裳，他用的都是平常的字句，你写得出他这个味道？”2006年夏末，王元化专程去拜访比他一岁的黄裳，两位老友坐在窗台沙发上，留下一帧相谈甚欢的合影，挚友相逢的由衷快意，溢于眉宇间。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2期)



品《关于美国兵》，“有点像水浒英雄上山前必须缴纳的‘投名状’，它为我成为一名记者起了同样的作用。”

从记者到散文大家

1945年下半年，黄裳成为上海《文汇报》的驻渝记者。此时的他尚未换装，揣着一匣印着特派员头衔的名片，身披G.I.“老虎皮”（美军制服）闯入连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都进不了的整军方案签字会场，完成了独家报道。

1946年夏，黄裳回沪，后一直供职于《文汇报》。他“访问过狱中的周作人，也访问过住在宫殿式的中央研究院里的傅斯年”，还和巴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巴金推荐下，黄裳出版了第一本散文著作《锦帆集》。紧接着，其专栏文字《旧戏新谈》也陆续出版，得到历史学家吴晗的高度肯定。

1947年前后，黄裳与年龄相差无几的黄永玉、汪曾祺往来甚密。在黄永玉眼中，当年还任中兴轮船高级职员员的黄裳“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个，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就昂然而出，和我们走了”。3人漫步霞飞路，评说天下，臧否人物。“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的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黄永玉《黄裳浅识》）

解放初，黄裳因《杂文复兴》这则短文“闯了祸”，被打成“右派”，此后近20年报上再不见他的文章，直到《读书》杂志面世才见其复出。

当时，黄裳的一系列文章给人惊才绝艳的感觉，连一批文章高手都争相阅读。作家舒芜曾有回忆：

“文革”中，黄裳的藏书曾被洗劫一空，这无疑是一沉痛一击，但他却说：“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这段话令多少爱书人喟叹，傅月庵就曾在《爱黄裳》一文中表示敬仰：“苦难让有些人变得矮小，有些人变得高大，黄裳先生无疑是后者。”

宽厚可爱的人

黄裳是《读书》仅有的从创刊一直写到生命终止前不久的33年的老作者。去年，他还以九二高龄与老友黄永玉双双在《收获》上开辟专栏，一个徜徉“来燕树”（《来燕树书跋》），一个闯荡“无愁河”（《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同时还愿意从容、健笔豪纵地应对着各方笔仗，幽默老将，气韵雍和。

令人扼腕的是，今年9月，容老（黄裳原名容鼎昌）已随黄鹤去，此地空余来燕树（黄裳书斋名）。

曾有沪上出版人回忆，昔日拜访王元化讨论“文章谁写得好”，王老断然下判：“文章写得好的当然是黄裳，他用的都是平常的字句，你写得出他这个味道？”2006年夏末，王元化专程去拜访比他一岁的黄裳，两位老友坐在窗台沙发上，留下一帧相谈甚欢的合影，挚友相逢的由衷快意，溢于眉宇间。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2期)



一九九一年，黄裳看望巴金

“二姐”李静

周曼妮 叶子



电视人李静